

海外视野

当大学教授，奥巴马够格吗

郭英剑

随着1月20日离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未来的去向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就在同一天，《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了一篇文章《奥巴马教授需要一个新工作，我们就来替他转发一下他的学术简历吧》。文章以半玩笑半认真的态度，整理并推出了奥巴马的最新学术简历，接着还采访了一些大学中的招聘委员会委员，其中不乏知名学者与法学专家，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依照奥巴马的学术简历，他能否通过面试并获得大学教授职位？

虽然这一问一答不过是“戏说”，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美国高校对于一个学者的认定有着内在的统一标准，而这些标准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

辉煌的简历：顶尖国际期刊文章引人注目

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学术界，要看其学术简历。而一份学术简历，无非看教育背景、教学经验、工作经历、科研成果、获奖与荣誉。奥巴马的简历可谓辉煌无比，令人目眩，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就教育背景而言，奥巴马1979年进入位于洛杉矶的西方学院，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83年毕业于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他后来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于1991年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曾经担任著名的《哈佛法律评论》刊物的主编。

再看教学经历。奥巴马曾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92年到1996年担任讲师，1996年到2004年担任高级讲师。在他任教期间，学校曾经给他提供常任职位，但被他拒绝了。由此可见，当时他志不在高校，还是希望从政之路。

其实，奥巴马很早就进入了政界。1997年到2004年间，他在伊利诺伊州担任参议员，2005年到2008年进入美国国会担任参议员。2009年到2017年，他担任第44届美国总统。

他曾经获得过的荣誉达到了世界顶峰。他200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在此之前，他还在2006年和2008年两度获得格莱美最佳诵读专辑奖。2007年，他还获得了全美有色人种协会所颁发的非虚构小说类的杰出文学作品形象奖。而在此之前的2005年，他还获得过这一

记者快评

「慢就业」考验高校功利心

陈彬

春节刚过，青岛市人社局便公布了一组2016年青岛市就业市场的数据。其中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该市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尤其是很多新毕业大学生并不急于寻找工作，而是选择自主创业或者较长时间的外出旅游甚至待业，慢慢考虑和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种“慢就业”现象在新生代就业群体中越来越普遍。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该市的调查中，52%的“95”后选择找一份稳定工作，但剩下48%的人则选择回避就业，这对人才市场的供给量产生了一定影响。

应该说，“慢就业”现象是近年来在就业群体中新出现的现象。该现象的出现与“95后”大学生强调个性和自主化有关。当然，也与目前整体的就业环境有关。而事实上，在国外，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现象久已有之，并不值得太过大惊小怪。

只不过，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的改变，除了影响人才市场的供应量之外，对高校整体的就业政策也带来了一定影响。对此，高校需要做出应对。

首先便是对高校就业率的影响。当前，毕业生整体就业率的高低依然是衡量高校就业工作的最重要参考标准，而“慢就业”现象的出现，必然会影响到高校就业率统计。对此，就业工作的衡量标准需要做出改变。事实上，单纯以就业率衡量就业工作的做法就不合理，“慢就业”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给高校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提供了契机。

其次，“慢就业”给高校的整体就业服务指导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以往高校的就业指导一般持续到学生签约为止，但在“慢就业”的情况下，学生的就业期限被大大延长，而毕业期限却没有改变。因此，如何在学生毕业后未就业期间，做好对他们的指导工作，需要高校就业部门认真考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慢就业”现象直接考验高校的功利心。这一现象的出现模糊了“学生”与“社会人”之间的界限。在此情况下，高校更需要关注学生的长远成长，甚至将学生整体的职业生涯发展纳入学校办学体系中，这中间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但这项工作远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因此，学校在多大程度上以学生为本，也就拥有多大程度的动力。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大奖中的主席奖。

当然，要想进入学术界，最终还要看学术成果。在这方面，奥巴马同样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单单在进入2017年1月份之内，他就连续在《科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哈佛法律评论》三家顶级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实际上，从他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其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也没有忘记在一些顶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大都与其执政政策有关，但据报道，这些文章也都是经过了严格审核才得以通过的，而且奥巴马本人都是唯一作者。

2017年1月9日，《科学》杂志发表了奥巴马题为《清洁能源：不可逆转的潮流》的文章。《科学》杂志作为国际科学领域中的标志性刊物，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就不用多作介绍了。奥巴马在2017年1月5日《哈佛法律评论》上的文章题目为《总统在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中的角色》，篇幅长达56页，脚注300多个。

有学者统计，依照国际期刊论文替代计量评分(Altmetric得分)系统评出的2016年世界学术论文影响力的TOP100，排名第一的是奥巴马！其文章是2016年7月11日刊登在JAMA上的《美国医保改革的成就与未来》，JAMA是国际四大医学期刊之一，影响力高达37.684。排名第一的奥巴马以8063分拔得头筹，比第二名高出了将近5000分！

依照以上这份辉煌的简历，奥巴马到任何一所高校去当一名教授，应该不存在任何疑问吧？

事实是：可能真有问题！

学术界戏说：奥巴马能拿到大学的 Offer 吗

因为奥巴马是法学博士出身，也曾长期在法学院任教，那么，如果未来到大学工作，他应该进入某高校的法学院。为此，采访者主要询问的是一些名校法学院的教授，特别是担任过招聘委员会委员的学者。

采访者提出的要求是：请把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放在一边，单单考虑作为学者的奥巴马，注重考察他的学术经历，也考察其未来的学术潜力，进而看他有哪些优势可以拿到教职。采访者还强调说，回答时可以尽情欢乐而不要有所顾虑。

从大家的回复来看，阻挡奥巴马能够顺利拿到高校教授任职资格的难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高教视点

处理学术抄袭，为何领导与师生有别

熊丙奇

论文查重是如今每个大学生在毕业答辩前的必经步骤，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标准，论文的重复率在10%~25%不等，基本可以被认定为抄袭，无法参加毕业答辩。近日有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的教师反映，院长雷裕春的9篇论文和1篇专著，经知网检测，重复率有的在30%，有的甚至高达94%，而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所有论文“不涉及抄袭”。

论文九成内容与其他文章重复，却为何不涉及抄袭？这从学术角度看令人匪夷所思，但从行政角度看却很容易理解。从高校目前处理学术抄袭的情况看，通常，当学术抄袭发生在普通教师、学生身上时，学校基本上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当学术抄袭发生在学院院长领导，或者有显赫学术头衔的学者、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师生身上时，学校却不从学术角度来调查、处理学术不端，而是从行政角度进行处理。进而，学校处理普通教师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和行政领导的学术不端行为实行的却是双重标准，对于普通教师学生非常明晰的学术抄袭标准，在处理领导学术不端时，就变得模糊不清。哪怕抄袭达90%，也可能被认定为没有抄袭。

对此，有专家认为，问题在于认定学术抄袭没有明确的标准，学术委员会在调查、处理时存在标

准缺失的困难。这显然是在为所谓的学术委员会的不作为进行开脱。如果没有标准，为何在处理普通教师学生的学术不端时，学校有标准？而涉及领导就不清标准了？如果论文重复在10%左右，认定抄袭可能还存在争议，当重复达90%还说搞不清是不是抄袭，这显然就是把学术当成儿戏了。按理，涉及领导的学术不端处理应该标准更严，可在处理领导的学术不端时，坚持一样的标准都难。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一再要求对学术不端“零容忍”，高校也明确了调查、处理学术不端的主体——学校学术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以及学术不端调查、处理的程序。可分析所有高校对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当普通学生、教师涉嫌学术不端时，学校的处理十分快速而严厉。比如，前不久复旦大学曝出一名博士生学位论文抄袭丑闻，从媒体曝光到学校做出撤销博士学位的处理，只用了3天时间；而当领导涉嫌抄袭时，这一套处理学术不端的机制和程序就失灵了，类似广西这所高校的新闻比比皆是。2009年，云南中医药学院院长涉嫌抄袭，该校学术委员会的调查将其认定为“过度引用”，舆论一片哗然，最终，院长也没因论文抄袭被

追究责任。说到到底，我国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其实并不独立，在处理学术不端时，高校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完全按学术规则进行调查、处理时，学术委员会就很快按学术规则进行处理；而当领导决定不启动调查时，哪怕学术不端事件已闹得沸沸扬扬，学术委员会也不启动调查。当学校承受不了压力，要求学术委员会启动调查，但规定调查只是走走形式时，学术委员会就装装样子。更突出的一种情况是，学术委员会必须做出符合领导心意的调查，这个时候的学术委员会就变为了赤裸裸的工具，成为学术不端的帮凶。

教育部于去年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作用，支持和保障学术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受理后，应当交由学校学术委员会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开展调查”。很显然，这需要高校学术委员会必须是能独立运行的真正的学术委员会，而不是只听命学校行政的摆设和工

作令人怀疑。迈克奥利斯特说，对于一个已经到了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人来说，招聘者都会非常谨慎，因为担心他们到学术界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比较安逸的退休职位而已。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维希伯格说，如果奥巴马要来，或许得从头做起，即从助理教授或者副教授干起，但这对于一个55岁的人来说显得有点怪异了。

第五，荣誉没有帮助。李奇曼说，虽然奥巴马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他来说也不一定加分，因为学术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各异。而且在一些人看来，他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与格莱美奖都是外在的评价，与学术无关。

如此说来，奥巴马就没有希望到高校任教了吗？

非也！这些受访教授也为奥巴马提供了两条出路：第一，他可以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具有特殊性质的教授职位——实践经验型教授。这一职位获得者的法律专业主要体现在某些领域的个人经验上。在李奇曼看来，如果奥巴马申请这一职位，他将能够成为一位有力的竞争者。当然，这一职位虽然不重视理论研究，但教学任务繁重，写作任务也不轻松。

第二，他可以继续做教学型的讲师。虽然学术不是奥巴马的强项，但他在此之前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并且是个优秀的教师，思想敏捷、富有个人魅力还乐于助人。如果他乐于教书，做个好教师应该绰绰有余。

从奥巴马总统到奥巴马教授

学术界之所以会热衷探讨奥巴马进军学术圈，原因在于奥巴马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他热爱教学。在任时他对高校以及高等教育一直非常关注，曾经多次到高校演讲。当然，奥巴马的未来并不用大家操心。其实，早在2015年，人们就开始讨论奥巴马离任之后的去向问题。当年8月份，不少媒体都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鲍林格尔宣布，奥巴马总统在2017年1月离任后，将回到母校哥大法学院任教，但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时光荏苒，一转眼就走到了今天——2017年2月。奥巴马的去向目前还不明朗。

依照惯例，每位美国总统在离任后都会建一所图书馆。据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将成为奥巴马总统图书馆的所在地。哥大又是奥巴马的母校。因此，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宣布，这位前总统将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相信人们都不会感到惊讶，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为此，我们可以在此先庆祝一句：您好，奥巴马教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作者手记

以上采访虽然纯属“戏访”，但毕竟是真人真事，从名校教授的回答中，我们还是可以明确看到美国高校在招聘教授时最重视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有雄厚的学术实力。这包括更多的科研成果和较为稳定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了学术成果，这自然代表着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但如果没有更多的学术成果作支撑，没有长期从事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重点，那么，这些顶尖期刊上的文章就成了空中楼阁，显示不出其原来所应该具备的学术重量。因此，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学术实力的内涵大致应该体现为：稳定

的研究方向、有潜力的研究课题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其次，要有出色的教学能力。一所大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教学；一位大学教师最基本也是其赖以生存的技能应该体现在教学上。虽然离开高校时间久矣，但因为曾经在高校任教，并且被公认为是一位优秀教师，在此次“应聘”过程中，这一点成为为奥巴马加分从而帮助他进入高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一位大学教授而言，无论取得多么高的学术成就，都要重视教学并具有高水平的教学能力，否则不能称为一名称职的大学教师。

域外传真

融资对于大学的意义

埃里克·托马斯

融资是我所做过的最艰巨的工作，但与捐助者协商交谈有助于提高大学的形象和鼓舞我的士气。作为一名副校长，我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和最苛刻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六名潜在的个人捐赠者坐在一起。这些潜在的捐赠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成功人士，我的工作就是努力让他们参与到大学的未来建设当中。

对于大学的整体战略，我的观点非常清晰，并且我也能够阐明首要考虑的一点——我们为什么选择他们，以及为什么捐赠者的投资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他们提出的质疑很严格、很有洞察力，并且偶尔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对于大学的计划，就会陷入巨大的麻烦中。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想出非常明确的体制战略，并且要严格遵守这一战略进行融资——这将大大有利于大学的规划。

如果你想寻求个人和组织的支持，就需要把捐赠者引入大学内，从而使他们与你的关系更加亲密。捐赠者的意见为大学和我都带来了益处，我们也从捐赠者的圈子和关系网中受益匪浅。一些捐赠者继续在大学担任非常重要的非执行职务。他们的支持大大鼓舞了我的士气，并且他们大多数人非常有趣。

毫无疑问，在政府提出资助计划之后，面向高等教育的慈善捐款开始增加。高等教育慈善捐款的总金额逐年增加，捐赠者的数量和未来财务承诺的价值也逐年升高。在不久的将来，高等教育慈善捐款的年收入将达到10亿美元——这是可能发生的。

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融资方面占有优势地位——融资金年收入在2亿英镑至2.5亿英镑之间，其他大学也筹集了大笔资金。政府在2015年至2016年的高等教育总投资金额为4.2亿，并且此资助金额还在降低——与此相比，10亿英镑不算小数目。在英国，高等教育融资也高于其他所有部门的融资，高等教育的年融资金额超过其他任何慈善部门年融资金额100万英镑。

那么，大学是否都在筹集资金？是，也不是。在广义上，高等教育领域分为两大类：大学——非常重视融资（数量相对较少）；其他学校则主要通过校友融资——而这并不属于真正的融资范畴。与此相反，在美国甚至最小的社区学院也非常重视融资。

我们希望教育机构能够意识到融资除了简单的收入增加以外的其他好处。积极的融资不仅能够获得投资的财务回报，我认为融资还能带来其他三个方面的益处：

- 1. 融资能够使机构明确其战略；
- 2. 融资能够具有影响力和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与你的大学关系更加密切；
- 3. 成功带来解放，而且融资能够鼓舞士气。

最后一点，意思就是成功的融资让人感觉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一个由各种外部机构——例如卓越研究框架和质量保证机构，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卓越教学框架——密切监视的世界中，融资是一件完全由你负责，并且能够让你真切切地感受到成功的事情。

此外，参与融资的人员的个性都是外向的、积极的和了解社会的，他们是缓解绝望和沮丧的高等教育界的一剂良药。

我的结论非常明确——大学的高级管理层，以及大学的领导和代表都应该参与到融资中。我对所有部门的建议是——为了融资所带来的诸多好处而接受融资。（作者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前副校长，田思敏编译）